



## 《文心雕龙·史传》与《世说新语注》缺载 范晔《后汉书》原因蠡测

吴圣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00)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23) 02-0118-05

范晔《后汉书》(以下简称“范书”)是关于东汉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书,历来为学者重视,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作为一部后出的东汉史著述,范书从成书到跻身“三史”,其传播和地位历经了一个过程。<sup>①</sup>而在范书的早期流传中,刘勰与刘孝标对于范书的缺载值得注意。

### 一、二刘对范晔《后汉书》的缺载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有一段关于汉晋史书的总结,其文曰: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sup>②</sup>

在此处,刘勰是基于史书采撰的得失标准,对以往史书进行了评价。值得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刘勰对于以往诸家后汉书,涉及到了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承、司马彪、华峤、《东观汉记》,却唯独没有提及范晔及其《后汉书》。从时间来看,刘勰主要生活时间与《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均在范晔之后<sup>③</sup>,客观上应不存在看不到范书的问题。而刘勰对范书的缺载并非特例,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中,《世说新语注》历来以广征博引、纠谬补缺而为人推崇,然在其所引用的有关东汉史著述中,也没有范书(见下表)。

[收稿日期] 2022-12-10

[作者简介] 吴圣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① 入唐后范书的地位状况,与当时“三史”观念的变动有着直接关联。相关研究请参见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五辑第二册《史记·秦汉中古史研究论集》,第475-483页;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成运楼《“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史学理论》2002年第3期。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5页。

③ 关于刘勰的生卒年及其《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由于没有确切的记载,学界尚无定论。对于《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主要有齐末和梁初两种说法。而对于刘勰的生卒年,则往往依照《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来推定,故观点也各不相同。但刘勰主要生活时间与《文心雕龙》成书皆在范晔之后,应是可以肯定的。参见陈祥谦《〈文心雕龙〉撰著时间发覆》,《求索》2011年第4期。

表: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引用东汉史书统计<sup>①</sup>

书名	引用次数	注文出处(页码)
谢承《后汉书》	1	德行第一(1)
谢沈《后汉书》	1	品藻第九(591)
薛莹《后汉书》	2	德行第一(7); 品藻第九(591)
司马彪《续汉书》	6	德行第一(5); 言语第二(66-67); 言语第三(89) 文学第四(327); 识鉴第七(453); 品藻第九(453)
张璠《汉记》	4	德行第一(8); 言语第二(74); 赏誉第八(493) 品藻第九(591)
袁宏《汉记》	2	德行第一(1); 政事(195)
《汉南纪》	2	言语第二(74); 文学第四(227)
《东观汉记》	1	言语第二(15)
《英雄记》	1	品藻第九(591)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具体成书时间学界虽有争议,但都认同在萧梁。<sup>②</sup>而这距离范曄入狱的元嘉二十二年(445)已逾半个世纪,客观上也不存在看不到范书的可能。

总之,无论是刘勰的“史传”篇,还是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他们在涉及东汉史著述时对范书都不予提及。

## 二、范曄谋逆不应为范书缺载的主要成因

对于范书缺载的情况,金毓黻先生有过论及。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一文中,也注意到刘勰对于范曄《后汉书》“无一语齿及”。对此,金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释:

然彦和之世,范曄《后汉书》已显,何无一语齿及?愚考其故,不外两端:一因范书多采华峤,兼及于司马彪,今日所见范书,渊雅可诵之处,大抵出自峤书。其栗密可征之典,又必出于司马。既据彪、峤,已笼括蔚宗之长在内,所谓举重略轻是也。二因蔚宗身被诛夷,名实俱殒,后世目为凶人,遂鄙视而不屑道。不惟彦和早持此见,即后来之子以为能免此也。实则蔚宗成书在后,实有出蓝之喻。<sup>③</sup>

金先生列举了两条原因,但其中有的解释值得商榷,如认为是范曄谋逆的事实,使得后人不愿提及其名,故造成范书不被提及。范曄谋逆对范书的消极影响确实存在,最直接的即是造成《后汉书》“志”部分的缺失。按范曄原本“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sup>④</sup>本有着作志计划,然因其谋逆入狱,这部分撰写也因此而终止。《后汉书》卷十《皇后纪下》李贤注引沈约《谢俨传》:“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曄败,悉蜡以覆车。”<sup>⑤</sup>范曄谋逆入狱影响了范书的最后成书。

然范曄谋逆是否如金先生所说,影响了人们对于范书的观感,造成了之后刘勰及其“后来之子”对范书“鄙视而不屑道”的状况?则难以确见。事实上,在刘宋之后的南朝政治环境中,对于范曄及其《后汉书》并非是讳莫如深。就范书而言,时人对范书并非“不屑道”,相反地还为其积极作注。如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曄书”<sup>⑥</sup>,吴均“注范曄《后汉书》九十卷”<sup>⑦</sup>,梁元帝长子方等欲“注

① 本表的统计数据参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附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中华书局2015年版。

② 关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成书时间,学界也无定论。最先由余嘉锡先生考证为“天监六年”,后陆续又有学者提出“天监元年”“天监初年”“天监七、八年”等说法。参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卫云亮《〈世说新语注〉成书时间新考》,《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③ 王应宪编校《中国古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97页。

④ 《宋书》卷69,《范曄传》,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01页。

⑤ 《后汉书》卷10,《皇后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7页。

⑥ 《梁书》卷49,《文学上》,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768页。

⑦ 《梁书》卷49,《文学上》,第775页。

范晔《后汉书》,未就。”<sup>①</sup>这表明,在范晔身后,人们没有因避嫌范晔的“凶人”身份而排斥范书,范书的流通也没有因此受限。可见,范晔谋逆并未完全影响之后人们对范书的观感,以范晔谋逆来作为二刘对范书不予提及的主要成因,并不能解释问题。

### 三、二刘的缺载处理应与范书史料裁选有关

既然范晔谋逆并未完全影响后人对范书的观感,刘宋之后,对范书作注补充的学人也不少,那为何刘勰、刘孝标二人在著作中仍会对范书不予提及?这需要我们先搞清楚《史传》篇与《世说新语注》中刘勰、刘孝标各自的关注点。

刘勰对于以往诸家后汉书的评价,是基于一种史书采撰的得失标准来看的。“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sup>②</sup>刘勰之所以以司马彪、华峤二人的著作为诸家后汉书之冠,重点夸赞华峤、司马彪二人著作,就是在于二者能做到“详实”“准当”。刘勰所谓的“详实”“准当”“偏驳”“疏谬”,简而言之,这都是对史料可靠性作出的评价,这里面没有涉及到史书体例、叙事文笔等方面,仅是就以往诸家后汉书的史料情况来发论。由此可知,刘勰在《史传》篇中,他所关注的是史料价值问题。

同样的,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也有着相似的关注点,刘注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补充史料。清人叶德辉曾统计过《世说新语注》的引书情况,他称“《世说注》中所引书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sup>③</sup>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增补了大量的史实,丰富了《世说新语》的原文面貌。他对于引书的选择,也定然有着史料方面的考量。

基于此,我们不妨推断:二刘著作中对范书的缺载处理,即应与二人这种对史料的讲求有关。换言之,即是当时范书本身存在的史料问题,造成了刘勰二人对范书的缺载。<sup>④</sup>那么,范书本身在史料上存在什么问题,会让刘勰二人在涉及东汉史著述时选择略过它?范书是在诸家后汉书的基础上撰成的,史料方面,在袭用诸家后汉史的同时,范晔也有所铨择删补,其自称“博瞻未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深意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sup>⑤</sup>范晔对于自己的工作是相当自负的,但学人对此却历来褒贬不一。如刘知幾就认为“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sup>⑥</sup>他对范晔的史料裁选是给予极高评价的。而相反,清人顾栋高就不太认可范晔的处理,他指出:“(范书)比谢承书、《东观汉记》所载人物,削去十之四五……今于人物多所阙略,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sup>⑦</sup>这两种评价看似冲突,但实则共道出了范书在史料处理上所呈现出的状态,即:对于以往“烦秽杂乱”的诸多后汉史记述,范书确实起到了删繁补略的作用。但同时,也“常有失之过简之弊”<sup>⑧</sup>,舍弃了部分有价值的史料。以华峤《后汉书》为例,范晔在袭用华书的同

① 《梁书》卷44,《世祖二子》,第688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4,《史传》,第285页。

③ 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题记》,《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附录二:序跋题识汇编,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6页。

④ 按刘勰、刘孝标二人当时所见到的范书,应仅是范晔生前所撰写的九十卷《后汉书》,即《后汉书》的纪传部分。范晔生前拟作志未果,因此长时间内,范书仅是以纪传单独通行。之后刘昭虽曾以司马彪“志”注补范书,但也并没有取代单行的九十卷纪传本。如《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刻,刘昭注。”《旧唐书·经籍志》:“(《后汉书》)又九十二卷,范晔撰,《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范晔所撰纪传单行本虽有九十七卷、九十二卷的卷帙差异,只是后人根据内容合成不同卷帙,实质并不差别。相关研究可参见罗炳良《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王少帅《〈四库全书总目〉之〈后汉书〉提要臆谈》,《历史文献研究》2021年,总第47辑。

⑤ 《宋书》卷69,《范晔传》,第2001页。

⑥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5,《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⑦ 惠栋《后汉书补注序》,载《后汉书补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⑧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时,往往会为行文简约而舍去一些材料,如范曄《后汉书》有关桓荣后代的记载:

(桓郁)子普嗣,传爵至曾孙。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孙鸾、曾孙彬,并知名。<sup>①</sup>

华峤《后汉书》载:

郁六子,普、延、焉、俊、酆、良。普嗣候,传国至曾孙绝。酆、良子孙皆博学有才能。<sup>②</sup>

桓焉明经笃行,有名称,以尚书入授安帝,拜太傅,录尚书事。复入授顺帝于禁中,因晏见言宜引三公、尚书入省事,天子从之。<sup>③</sup>

焉长子衡,早卒。中子顺,顺子典。典十二丧父母,事叔母如事亲。立廉操,不取于人,门生故吏问遗,一无所受。<sup>④</sup>

两者比较,范书以短短数语便概要了桓荣家族的状况,行文上确实更加简要。不过,若就史料内容来看,现存华书的原文内容仍要比范书要丰富得多,史料价值也更高些,若非华书佚文得以保留,仅凭范书的记述,我们恐怕难以得知桓荣后代情况,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sup>⑤</sup>可见,对于范书的史料,我们不能以范曄自评为据,简单的评价为完备,范曄在史料处理上也存在着一些疏漏之处。

要之,范书在当下虽被视作为有关东汉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书,但若回到早期与诸家后汉书等著述并存的时间里,仅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范书在其中恐怕并不算突出。范曄生前所撰写的90卷《后汉书》,其纪传内容主要依托于当时诸家后汉书等相关著述改撰而成,“博瞻未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sup>⑥</sup>范书在史料上重在“整理”,其内容并未有太多超出。同时,范曄对史料处理,在去除冗杂的同时,也使得范书删去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故对于时人而言,《东观汉记》等东汉史著述仍有着不低的参考价值。这即应是以史料为关注点的二刘在涉及东汉史著述时,会出现略过范书的原因。

范书在史料上的缺点,我们还可从注书的角度观察到。前文提到在刘勰二人对范书缺载的同时,时人对范书还有着积极作注的情况。除去《后汉书音》1卷、《范汉音训》3卷、《范汉音》3卷这些偏向文字训诂式的注书外,还有着类似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大篇幅的注书存在,即《后汉书》刘昭注。现存的刘昭注仅保存有《后汉书》志30卷的内容,但历史上刘昭注涉及范书全书,《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刻令刘昭注。”<sup>⑦</sup>前者指范曄生前所撰的《后汉书》纪传,后者则即为刘昭注本的《后汉书》。刘昭注之所以篇幅如此之大,除了他将司马彪《续汉书》志并入范书之外<sup>⑧</sup>,还与刘昭注的关注点直接相关。史载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曄书,世称博悉。”<sup>⑨</sup>刘知幾也曾评价刘昭注:

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患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sup>⑩</sup>

同裴注一样,刘知幾对于刘昭注的评价不高,认为失在繁复,不知拣选。但这恰反映了刘昭注的特点,即与裴注类似,都是侧重于搜集、补充史料,而略于文字训诂。事实上,以刘昭现存的补注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内容来看,刘昭注中“共引《东观汉记》十八条”,“引袁山松书22条,谢沈书8条,

① 《后汉书》卷37,《桓荣传》,第1257页。

② 华峤《后汉书》卷2,《桓荣传》,载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45页。

③ 华峤《后汉书》卷2《桓荣传》,载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545页。

④ 华峤《后汉书》卷2《桓荣传》,载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546页。

⑤ 周天游先生在《八家后汉书辑注》书中对于诸家后汉书佚文有着详尽收录,可与范曄相关文字对比。参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

⑥ 《宋书》卷69,《范曄传》,第2001页。

⑦ 《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82页。

⑧ 罗炳良《范曄〈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⑨ 《梁书》卷49,《文学上》,第768页。

⑩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5,《补注》,第123页。

谢承书 3 条,薛莹书、司马彪书各 1 条,总计 35 条。”<sup>①</sup>可想而知,对于范曄原本的九十卷内容,刘昭对史料补阙也定不会少。刘昭注的出现,正是时人对范书所存在的体例与史料缺陷的一种完善之举,这也反证范书在史料上确实存在着阙漏。

综上所述,刘勰、刘孝标二人在著作中对范曄《后汉书》的缺载处理,与范曄谋逆的个人原因应无直接关系,而同该时期范书本身状况有关。范曄生前撰写的九十卷《后汉书》在史料择选上,存在阙漏不足。这使得之后在著作中以史料为关注点的刘勰二人在涉及东汉史著述时,会选择参考其它著述而略过范书,故而造成了《文心雕龙》“史传篇”与《世说新语注》中不论范曄《后汉书》情形。

<sup>①</sup> 范学辉《试论刘昭〈后汉书志〉注的史料价值》,《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汪高鑫)

(上接第 112 页)

## On the Category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Local Record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ng Xu

**[Abstract]** The category of “towns and villages” (乡里) in the local record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riginated from earlier map books, and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place name, local scenery and other content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records. It didn't wildly record the situa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map book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ontent were limited to the number and names of town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local records of “towns and villages” have been very common. The compilation principle of “unified style” in Xiangfu's *ZHOUXIANTUJING* had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local records, but at this time, it has not been standardized by special categor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towns and villages” in local records was further developed, which reflected in the its number increased greatly.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towns and villages” had special categories and rich the content.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towns and villages” not only meets the need to senior officials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but also had educational function. The reason for the disorderl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and the vague jurisdic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are as follows: the diverse sources of gazette material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ompilation, the change of the compilers; The “localization” features of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ocal record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map books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category of “towns and villages” system of towns and villages

(责任编辑 汪高鑫)